

宋朝未统一大理国原因新论

于爱华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宋朝立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这与宋朝统治者对唐宋以来西南边疆防御体系的变迁,对自身地缘政治局势的判断,以及恪守“重北轻南”地缘战略不无关系,同时还与宋朝统治者对云南地缘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深入密切相关。

关键词:宋朝;大理国;西南边疆;边疆防御;地缘战略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30-05

New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that the Dali Kingdom was not Unified in Song Dynasty

YU Ai-hua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abundant for the unity of the Dali kingdom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Song dynasty and it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about the changes of the frontier defense system, the judgment of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insist on preferring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s well as the plain understand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cal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from the contemporary central government.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he Dali Kingdom; the southwest frontier; the defense of the frontier;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y

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平蜀后,属下王全斌主张“欲乘势取云南”,太祖“鉴唐天宝之祸起于南诏,挥玉斧划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①此举欲凭借大渡河的天险,以兵设防,对大理国严加防备。后又以“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为理由,放弃对大理国的开拓和经营。宋初的这一抉择,表明了宋朝统治者对大理国的态度,亦基本奠定了宋与大理国关系的基调。

目前,学术界关于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关注较多,研究成果不少。其中,关于宋朝未能统一大理国的原因,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两宋立国,内忧外患,国势衰微而无暇顾及西南;第二,宋王朝受“守内虚外”治边方略的影响,同时吸取了唐诏关系的历史教训,基于“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认识下,认为唐朝虽因黄巢起义而覆灭,起因却是为防御南诏之桂林戍兵发动的兵变,遂与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1-5]事实上,至于宋朝为何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究其原因,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笔者认为,宋朝放弃对大理国统一这一重大边疆战略的实施,与宋朝全国地缘形势的判断密切相关。首先,统治者对全国地缘局势的审视后,清楚地看到唐朝以来所构筑的西南边疆防御体系已经不复

存在,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力大为削弱,为减轻北方政治、军事压力而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其次,当时的宋朝统治者对西南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于是放弃了对云南的统一,而这一判断也给日后宋朝自身的覆灭埋下了隐患。再次,就全国地缘政治形势而言,宋朝统治者恪守汉唐以来的“重南轻北”的地缘政治观,所以对西南地区的重视自然不够。

一、唐宋西南边疆防御体系的变迁

唐朝立国后,积极经营边疆地区,对西南地区亦不例外。武德元年(618年),唐朝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经营。“开南中置南宁州”^②,下辖9县,主要在滇东北一代。武德七年(624年),设置南宁州都督府(治今云南曲靖西),下辖16州。南宁州都督府的设立,标志着唐朝在滇东北地区的统治已经逐渐稳定。贞观元年(627年),唐朝废南宁州都督府,并以其所辖之州县隶属于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随着唐朝统治的不断深入,唐势力由滇东北和滇中逐渐向西面和北面发展,经营的重点也逐渐转向滇西和滇北地区,这一举措的主要标志就是设置姚州都督府。麟德元年(664年)唐朝正式设置姚

收稿日期:2014-09-27

作者简介:于爱华(1981—),女,云南宾川人,讲师,历史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研究。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干德三年正月丁酉条。

②《旧唐书》卷41,《地理四》。

州都督府,且每年从益州募兵五百,由都督率兵镇守。姚州地处爨氏与南中西部及洱海地区各部的交界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关于姚州的地缘战略地位,清人师范描述:“自姚州而西,则指叶榆,趣大理。自姚州而南,则出威楚,向昆明。为全滇之要会。”^①姚州还位于四川嵩州通往洱海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唐朝设置都督府于此,是有战略上的考虑的。唐朝设置姚州都督府,旨在进一步经营洱海地区,并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然而,事与愿违,当地少数民族的复叛复降,使得姚州都督府对洱海地区的经营并不稳固。天宝年间,唐朝与南诏交恶,天宝十二年(753年),唐玄宗命汉中郡太守袭礼内史贾奇俊率军至云南郡,欲再置姚州都督府。但此次行动遭到阁罗凤的抵御,因此唐朝再置姚州都督府的愿望并未实现。

唐朝对川西南地区的经营也非常重视,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和嵩州都督府(驻今四川西昌)成为唐朝经营川西南的两个重要据点。嵩州、戎州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拥有重要的交通线,且唐朝以此作为经营云、贵地区的重要据点。四川是唐朝经营西南地区的重要据点,唐初实行的是由川西南实现对云南地区的经营。唐初在今川西南和云南地区大量设治,期间先后有所调整,大致形成了若干都督府统辖羁縻府州,分片管理今云南和川西南地区的格局。唐朝与南诏交恶,关系彻底破裂后,嵩州和戎州便成为唐朝与南诏争夺的重要军事阵地。

就岭南地区而言,唐朝亦采取积极的经营态度。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全国为十五道,岭南道划分为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五府(或称五管),各置经略使。安南经略使治安南都护府,即交州。五府统由岭南节度使(又作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节制。“岭南经略使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②岭南五管对于唐朝在广西和越南北部的稳定统治至关重要。安南都护府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年)设置,职掌“抚慰诸番,辑宁外寇,规候奸谲,征讨携贰”^③。安南都护府设置后,期间有所变动。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改安南都护府为镇南都护府,加都防御、观察等使,管兵四千二百。广德二年(764年)改为大都护、经略使;大历二年(768年)复改为安南都护府;德宗贞元七年(791年)置柔远军于安南都护府。岭南五管的设置,加强了唐朝在岭南的统治和防御。

这样一来,唐朝构筑的西南边疆防御线,以嵩州、戎州作为经营川西南的重要据点,并以南宁州都督府为据点,对云南的统治由滇东向滇中和滇西逐

步推进。在广西地区,则设置岭南四道以及安南都护府共同管控广西与越南北部。

但是,唐初精心构筑的西南防御体系,在唐高宗中期时被打破。吐蕃势力在青藏高原崛起,并频繁南下侵扰唐朝西南边境。永隆元年(680年)之前,吐蕃攻陷安戎城,南下并占据洱海周围和嵩州以西的区域,此举引起唐朝忧虑。神龙三年(707年),唐朝发兵征讨吐蕃,取得小胜,但唐军撤离后,吐蕃势力卷土重来。为遏制吐蕃势力南下,唐朝采取新的地缘战略,积极扶持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即后来的南诏。南诏在与唐朝在联合抵御吐蕃势力南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南诏势力的坐大,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唐朝对南诏的控制开始力不从心。天宝四年(745年),为遏制南诏势力,唐朝筹策开通步头路,此道自安南都护府,北经步头(今云南建水)、安宁城(在今云南安宁)达于戎州都督府,具有重要的军事用兵价值。步头路的修建,其目的之一是加强对滇东爨氏的控制。^[6]除此之外,从地缘战略角度讲,此举借助戎州都督府和安南都护府的通达,从北向东形成包围圈,进而对南诏形成包围钳制之势。所以,势必受到南诏的反抗。

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再次发生巨大改变。同年十一月,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唐,直到763年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此事件给唐朝造成不小震动,也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一事件给南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南诏遂发展成一强大地方政权。南诏坐大后,不断向外扩张,严重冲击着唐朝的西南边疆防御体系。大中七年(853年),安南都护李琢管理不力,后又撤去防御南诏进攻的部分军队,导致南诏紧逼安南,这对唐朝西南疆域的防护造成较坏的影响。南诏攻陷安南,与李琢撤去防御守军不无关系。大中十二年(858年),南诏初犯安南。咸通元年(860年),安南土蛮引南诏兵3万余人攻下河南(今越南河内),次年又攻下邕州(今广西南宁)。随后,南诏多次攻唐,“南蛮攻邕州,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人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盗。”咸通四年(863年),南诏二陷安南,“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虜且十五万人,留兵二万”。至咸通七年(866年)唐朝才收复了安南。除了攻打安南外,南诏还进犯川西。咸通六年(865年),南诏再攻嵩州,两林蛮不满刺史喻士珍贪婪,开城门纳南诏军。咸通十年(869年),

①师范:《滇系·疆域》。

②《资治通鉴》卷215。

③《旧唐书》卷44,《职官三》。

南诏倾国攻蜀,进而攻下嘉州(今四川乐山),随后又攻下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和邛州,进抵成都城下。乾符元年(874年),南诏进攻西川。

南诏对唐朝西南防御线的进攻,给唐朝的西南边疆造成巨大危机。正如史料所载:“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因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史称南诏“为边寇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①。实际上,唐朝对西南边疆的管控,主要通过若干都督府统辖众多羁縻府州来实现的,对西南地区的管理较为松散。这样一种管理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来的边疆防御体系,主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盾来实现。所以,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微,对西南边疆的管控力和防御能力自然亦大大降低。

唐朝后期,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时期。安南地方势力乘机崛起,当地土豪曲承裕、曲承美、杨廷艺、皎公羨先后控制安南,邀封或自称节度使,南汉虽统安南,但无力控制。939年,安南军将吴权杀皎公羨,自立为王。吴权死后,自944年到968年,暴发了“十二使君之乱”,安南陷入连年混战。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唐朝西南边境防御体系的瓦解,对于唐朝自身的存亡有着毁灭性打击,正是这一防御体系的崩溃,唐朝西南缺口被打开,最终导致整个唐朝的覆灭。^{②③}自唐朝后期,安南都护府的失陷,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对交州的统辖权后,中原王朝对于中南半岛的统辖和控制进一步削弱,交趾出现独立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到了宋代,统治者承认交趾的独立,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对交趾乃至整个中南半岛的统辖,自此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元朝国力强盛、兵强马壮,曾几次试图恢复对中南半岛的统辖,但均以失败告终。明朝立国后,曾经仿效元朝试图恢复中南半岛的统辖权,均未能获得成功,清朝则在总结元明两朝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务实的策略,承认并册封中南半岛诸国。事实上,交州于中

南半岛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元明两朝对中南半岛用兵失败的事实均与放弃交州的统辖权有莫大的关系。

宋朝立国后,北方地区远未实现统一,且军事实力不如唐朝,而构筑像唐朝一样强大而漫长的西南防御体系需要强大的军事和物质基础,对此宋朝力不从心。这就是为什么宋朝总结唐朝经验后,狭隘地将大理国认定“祸根”,认为只要“远离”祸根便能长久治安的原因。因而,整个宋朝始终把与大理国的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不温不火的状态。

二、恪守“重北轻南”的地缘战略

“国家的战略疆域、地理位置、接壤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7]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对于国家制定相应的地缘战略至关重要。宋朝立国,恪守“重北轻南”的地缘战略,且视大理国为“外藩”而放弃对其统治的做法,与宋初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实施了“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廩虚竭,必先取巴蜀,次及荆广、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④北宋建立之初,其疆域:“东南际海,西尽巴夔,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⑤与汉唐时期相比较,宋朝所统治的疆域非常狭小,仅比秦略大,且南宋疆域比之北宋更加缩小。“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四夷不服,中国不尊。”^⑥此话基本上概括了宋初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北方地区上,与北宋对峙而立的是辽。辽俨然北方一大帝国,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⑦。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予辽。“燕云十六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向来为中原王朝控扼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于宋朝北部

①《资治通鉴》卷249至卷253。

②实际上,关于唐朝的西南边疆防御体系的建立、瓦解,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和探讨。陈国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西南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2010年第3期;陈国宝:《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郭声波:《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杨爱民:《唐朝姚州都督府废立问题刍议》,《昆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③《东都事略》卷32,《列传六》。

④《宋史》卷85,《地理志一》。

⑤《欧阳修全集》卷60,《本论上》。

⑥脱脱:《辽史》地理志一。

边防至关重要。时人对其有所描述:“自是中国非但失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①“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得中原王朝的长城防御体系被打破,北方防御线缺口洞开。宋朝“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8]。“惟是北狄强盛,十倍羌人……今契丹尽吞诸蕃,事力雄盛,独与中原为敌国,又常有凭陵之心。”^②王安石曾说:“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又如今契丹。”^③燕云地区对于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史载:“阿保机并小族称帝,援立石晋,又得其所割雁门以北幽州节度所管十六州。盖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后,山险皆为所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以据守矣。”^④可见燕云在北方地缘线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而宋朝正是由于失去这一重要据点,才失去了北方防御线上的优势,使契丹始终成为其心腹大患。

在西北地区,西夏成为宋朝的又一劲敌,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9]有宋一朝,西夏“外倚北戎,内凌中国”^⑤,对宋朝发动多次侵扰战争。究其原因,与西夏占有重要战略据点——河西走廊有莫大关系。从地缘角度进行分析,河西走廊为西北地区一重要战略要地,是中原大地的西部屏障,是中原王朝平胡羌、通西域的重要出口,兼具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意义。历史证明,谁控制了这一地区,谁就能拥有战略主动权。而宋朝恰恰丧失了这一地缘优势,所以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境地。宋王朝也曾效法“汉通西域诸国,谓之断匈奴右臂”^⑥,常遣使臣出使青唐吐蕃、甘州回鹘、草头鞑靼和西域于阗等国,欲与之结成犄角之势,断西夏右臂,恢复汉唐故地。但终因地缘优势的丧失而未能成功。西夏则据有这一战略优势,给宋朝的西北国防线造成不小的国防压力,宋神宗曾说:“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唯恐其盗边也。”^⑦1127年,南宋仓皇立国,疆

域向东南一隅压缩,地缘战略优势更加不复存在。可以说,自立国伊始,宋朝便丧失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因此,宋朝在国防上的先天弱势是明显的,这与宋朝地缘优势的丧失不无关系。事实上,这也正是整个宋朝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根源所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邻国越多,该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就越差。宋朝外交环境差且复杂,“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⑧北宋“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⑨且“兵多而战未胜”^⑩,所以时人感叹“天下之弱勢,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⑪。

在西南地区,大理国和交趾是两股重要力量。大理国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緬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⑫。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已经达到今緬甸、越南和老挝的北部。交趾在东南地区的势力也不可小觑。宋朝统治者对全国地缘局势进行审视后,在西南地区采取谨慎策略,放弃了对大理国和交趾的统一,于是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三者并存的地缘格局。宋朝西南地缘战略除是统治者愚守“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错误历史认识外,似乎也是受北方地缘形势影响而无暇南顾下的一种无奈选择。景德三年(1006年),邵晔又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图,宋真宗则认为:“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如照临之内,忽有叛乱,则须为民除害也。”^⑬宋朝与大理国一样,也是缺乏武力统一交趾的勇气,只想“但羁縻不绝而已”^⑭。与宋朝统治者的一厢情愿相反的是,尚处于向新兴封建国家转化的交趾,对宋发动了频繁的大大小小的寇边事件,这无疑增加了宋朝西南边防线的地缘压力。南宋立国后,情况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西南地缘政治格局依然复杂。

①《大学衍义补》卷1511,《治国平天下之要》。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

④程大昌:《北边对略》,见《古今说海》卷10。

⑤《范文正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见《范文正公集》。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元丰七年十月癸巳。

⑧蔡條:《铁围山丛谈》卷5。

⑨《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真宗咸平二年二月癸亥。

⑪《叶適集》卷5,《纪纲三》。

⑫《元史》卷61,《地理四》。

⑬《宋会要·蕃夷》卷4。

⑭《宋史》卷90,《地理志六》。

从宋朝的整个地缘政治环境来分析,宋朝先天丧失了北方和西北地缘战略优势,并成为边患最重和国防压力最严峻的地区,这种国防压力严重威胁着宋朝自身的存亡,是历代统治者所不曾面临的,始终成为宋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基于北方地区的地缘压力,宋朝统治者始终把防御的重心放在北方地区。立国之始,统治者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这样的认识和考量之下,宋朝统治者对北方地区的防御较为重视,对南方地区则无暇顾及,由此形成了“重北轻南”的地缘战略,且为整个宋朝处理南北方关系时所遵循。缘由于此,这也就不难解释,宋初为何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

三、宋朝统治者对云南地缘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

历代政权对于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地缘战略的实施,于王朝本身的生存至关重要。对地缘战略形势的判断,意味着实施不同的地缘战略或者治策,这样一来,对宏观局势的把握,于王朝的治策,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治策尤为重要。历代封建统治者立国后,基于对全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分析,尤其是南方和北方的地缘形势及其在全国的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判断,分别制定出符合北方和南方实情的边疆治策。宋朝统治者早在全国统一战争中,就有了关于全国局势的判断,而对西南边疆局势的判断,促使宋朝统治者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这一治策给宋朝的西南边疆及其边疆的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见历代封建王朝关于云南在西南乃至全国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云南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付诸实践的,当始于元朝。在元朝的全统一战争中,郭宝玉曾经向成吉思汗建议:“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籍以图金,必得志焉。”明确了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在整个元朝霸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就战略地位而言,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正好处于对中原王朝弧形包围圈的薄弱环节,由青藏高原南下很容易被攻破。因此,云南的设防于整个西南边防线的巩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云南一旦失守,意味着腹地将处于危险境地。而事实上,元朝正是采用了郭宝玉迂回包抄的战略战术,先夺下云南,取得云南诸部的支持,最后完成统一全国的霸业。云南被攻破,也就意味着宋朝的西南边防被打开了缺口,形成了包围夹击之势。正是由于云南在元朝统一霸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元朝对云南的经营尤为重视。缘由于此,明清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云南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有重要认识,并且积极经营云南地区。

明朝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西南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为避免蒙古汗国包围南宋的故事在明代重演,明统治者对西南地区格外重视。为加强西南

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地位,明朝在西南地区主要有两项重要举措:第一,动用武力收复云南。明朝统一全国后,基于内陆边防的考量,调动大军远征云南,驱逐梁王势力,直接接管并统辖云南行省;第二,为加强对云南地区的有效控制,明朝开辟一条从湖广直抵云南的便捷通道,为确保这条通道的畅通,明朝不遗余力地在贵州置省。明代以前,历代王朝并未对贵州实现真正的直接管辖,贵州一直被统治者认为是蛮荒之地,只是略加羁縻而已。传统上,云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通道,主要是通过巴蜀进而控辖云南,这一通道在元朝以前不曾改变。通过四川进入云南,进而联系中原的这一大通道,正好处于游牧民族的边缘线上,一旦被游牧民族所截断,云南地区将处于危险境地,不攻自破。因此,加强对云南地区的管控,对整个西南边防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在贵州设省这一战略,与明朝的整个西南边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旨在加强与云南的联系,增强对西南地区的有效控辖。

清统治者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关于云南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清人顾祖禹有过这样的描述:

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渔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猺獠爨楚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10]

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对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是有清醒认识的。清朝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举措,与其对西南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考量不无关系。雍正年间,漠西蒙古日益强大并开始南下,严重威胁着清朝的西南边疆地区,而清朝的“改土归流”活动合乎时局,解除了西南边疆危机。正是基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云南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性不断深化认识,才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的经营和统治,促进了云南地区的不断开发和发展。

与此相反的是,宋朝统治者恰恰对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地缘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深入,所以宋初便放弃了对云南的统一,并将大理国视为“外藩”。这一做法,与统治者对云南地缘战略地位的认识有莫大的关系。宋朝统治者放弃对大理国的统一,并将其视为“外藩”这一决策,表面上,减少了管辖大理国所需成本,在宋朝存在期间保持了西南边疆的相安无事,但从长远来审视,宋朝统治者这一做

(下转第52页)

干纳和克什米尔等帕米尔高原周边地区的局势,同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将河中等中亚更西部的地区置于中原王朝的强势影响之下,并时刻注意境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情况,抓住时机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壮大或取得靠近中国的根据地,才能真正保证西域的安全,实现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意图。虽然清王朝所面临的总体安全形势相比汉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就新疆而言,则一些历史经验还是适用的。然而清朝的国家体制已不允许类似汉唐时期的强大边镇存在,更不能允许封疆大吏、军事将领自行其是,这有助于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防止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但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同时也削弱了军队的应变能力,更令中央政府视“安内”远重于“攘外”,在对外决策时倾向于妥协求和,而随着承平日久,军队腐化、军备废弛也就不可避免,面对外部威胁自然难以应对。清政府在乾隆盛世时尚不能消灭以和卓后裔为首,流窜于中亚的一小撮匪徒,19世纪后,面对浩罕利用和卓后裔发动的入侵疲于应付,更无法抵御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以至于丧失了大片领土。值得庆幸的是,当浩罕阿古柏窃据新疆十余年后,清政府最终不畏英俄阻挠,做出了武力收复新疆的决策,终于使这一对中国的统一与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之地区的主体部分保留在现代中国版图之内,无论人们对清王朝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这一历史功绩理应被永远牢记。



(上接第34页)

法,使其丧失了西南的重要战略地位,而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区域都产生至关重要影响。这样一来,整个宋朝在北方和南方地区皆丧失了地缘战略优势,这于自身存亡极为不利。宋朝放弃大理国,等于放弃了对云南地区的统辖权,于西南边疆的稳定极为不利,这也给后来自身的灭亡埋下了苦果。所以,宋朝的灭亡与唐朝一样,不是北方防守的失误,而是“宋亡于蒙古,而祸起于大理”矣,这一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 [1]方铁. 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9):5-20.

[参考文献]

- [1]佐口透. 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M]. 凌纯颂,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 [2]林恩显. 清王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 [3]刘正寅,魏良弢.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聂红萍,王希隆. 鄂对家族与清代新疆政治[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2):40-41.
- [5]苗普生. 伯克制度[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 [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庚编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7]李晶. 乾隆年间清朝与阿富汗关系新探[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1):126-127.
- [8]潘向明. 清代和卓叛乱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9]潘志平. 浩罕国与西域政治[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10]费正清. 中国的世界秩序[M]. 杜继东,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1]管守新. 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 [12]钟兴麒. 西域图志校注[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 [13]王治来. 中亚通史:近代卷[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 [14]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2]方铁. 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47-51.
- [3]胡绍华. 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新探[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6):42-44.
- [4]刘永生. 两宋王朝与大理国关系研究[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80-82.
- [5]周祐. 大理国与赵宋王朝的关系[J]. 大理师专学报,1996(4):11-12.
- [6]方铁. 西南通史[M].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2003.
- [7]彭光谦等. 军事战略简论[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 [8]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9]吴广成. 西夏书事校证[M]. 郑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10]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点校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05.